

道德基因增強：
價值衝突與治理挑戰
Moral Gene Enhancement:
Value Conflicts and
Governance Challenges

張新慶 楊 璿

Zhang Xinqing and Yang Xuan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novel issue of moral bioenhancement, this article critiques the concept of ‘moral genetic enhancement’ on three fronts: its lack of a scientific basis, the inevitability of value conflict, and its destructive impact on the social–moral fabric. The article ultimately advocates for robust ethical oversight and public

張新慶，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中國北京，郵編：100193。
Zhang Xinqing,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China, 100193.

楊璿，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中國北京，郵編：100193。
Yang Xuan, Master's Studen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China, 100193.

《中外醫學哲學》XXIII:2 (2025 年)：頁 159–16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2025), pp. 159–163.

engagement to preserve the wholeness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human essence of morality.

一、適度支持道德生物增強的立場

Eberl 和 Ajibola 在《我們能通過生物技術構建道德更為完善的人類嗎？》一文中，採用了大量篇幅闡釋了亞里士多德的觀點：道德美德並非天生，而是通過習慣養成發展而來的。的確，道德提升是一個通過後天持續實踐塑造理性的過程。這種實踐智慧使個體能夠辨別倫理問題、權衡利弊，並選擇擺脫道德困境的正確方式。與此同時，二人在文中還綜述了多位學者關於贊同道德生物增強的觀點。例如，Persson 和 Savulescu 等主張：為了人類生存所需而借助生物技術干預來更強的獲得美德的能力。Fröding、Rakić 認為，等人通過增強特定情緒狀態或在受神經學限制時促進實踐推理過程，可能有助於某些個體培養道德美德。

本著兼聽則明的態度，Eberl 和 Ajibola 也系統梳理了反對道德生物增強論者的觀點。例如，Wiseman 反對將複雜的道德決策簡單還原為大腦的神經化學反應，製造了道德大腦的神話。又如，MacIntyre 強調，美德是在社會關係和實踐中養成的。Eberl 和 Ajibola 一文中中肯地指出，看似“抄近路”的道德生物增強的風險極高且難以控制，也無法培養出真正包含理性判斷的美德，反而犧牲了人之道德能動性和人格尊嚴。

對此類觀點，Eberl 和 Ajibola 並沒有表現出言辭激烈的反駁，反而是就得這將是對亞里士多德的美德習得模式的可能補充，這是在道德上應該被允許的。Eberl 和 Ajibola 在文中指出：從原則上講，通過生物技術手段改變與道德相關的情感和認知狀態，可能並無不妥；但這是否是實現道德品質可靠提升的最有效手段，仍有待觀察。其背後的認識基礎或許是：基於人類生來就有獲得美德的潛力的前提，推測出道德生物提升可能影響會情感或行為。二人在全文的最後還再次呼應了 Shook 的觀點：不應懷疑道德增

強可能性，對特定種類的道德增強給予適度支持似乎是明智的。直接的生物技術手段可能有效實現這種一致，使道德主體能夠更自主、真實地按照其培養的道德性格意願行事。

顯然，Eberl 和 Ajibola 持有一種適度支持生物道德增強的立場，只是視之為一種臨時輔助手段，幫助行為主體使其行為與更好的判斷保持一致。二人坦言，這些基因干預因不能充分參與主體的理性思考、意志或面對道德衝突的過程而無法實質性參與到人的美德形成過程。

二、道德基因增強：烏托邦幻夢與現實困境

Faust 稱，通過編輯影響我們道德品質的基因，改變人類行為的藍圖。這中道德基因增強設想點背後的基本假設是：借助基因干預措施來定向強化或弱化某種道德觀念、道德動機或道德推理，以便為後天的道德教化創造先天條件。很顯然，在目前科技發展水準下，這樣的想法僅僅停留在暢想階段，沒有可靠的研究成果揭示哪些基因與人的同理心憐憫、誠信、仁義、感恩、公平等道德心理義務或外在的道德能力有密切關聯；因而任何所謂的道德基因增強的措施都可能是無的放矢。在我們看來，上述道德生物增強的支持者只不過是烏托邦式的暢想而已，生物增強特別是基因增強是難以在道德層面增強人的認知、態度和行為傾向的，具體的論證如下：

道德基因增強試圖通過操縱人的基因，以強化人的道德意識、情感及行為傾向。這種天馬行空式的設想多見於科幻小說之中，而缺乏基本的科學依據。道德判斷源於大腦高級認知功能、情感調節、文化習得與社會互作結果，無法歸結為基因決定論。通過編輯多基因（如 FOXP2 語言基因、BDNF 智力相關基因），可能會賦予人更強的語言能力、記憶力或運動天賦的爆發力。（Yang et al. 2003）。這些所謂的能力等都是由多個基因的微小效應作用結果，與教育、營養、訓練等環境因素密不可分。基因編輯技術

(如 CRISPR-Cas9) 仍因脫靶現象而導致非目標基因位元點的突變，誘發實質性的疾病風險 (Ledford 2020)；而同一基因參與调控多種生理過程，貿然改變它可能產生非預期的行為後果。

除了技術可行性差之外，贊同道德基因增強的學者面臨一個無法回避的前置性問題：由誰定義何種道德“值得”增強？這很難達成共識。深植於差異大的文化傳統和與生活方式之中的道德觀念具有相對性。Persson 和 Savulescu 提倡帶有西方自由人文主義的價值觀，推崇普世同情與關愛陌生人，而儒家家庭主義則以“差等之愛”為基石，視親緣關係為道德之本。定義應基因增強的道德時，應優先“博愛”還是“孝悌”？這種價值衝突難以調和。若將特定道德品行確立為基因增強的首選，則會有倫理專斷與文化霸權之嫌。

在生命權力與商業資本的裹挾下，道德基因增強非但無法培養真正的個體美德，反而會削弱社會習俗、道德規範和輿論引導等後天教化的作用與價值。即便人類通過基因技術增強了“共情”，但這種負載了不同文化價值觀的共情帶有偏見，如可能強化對群體內部的關愛，卻加劇對群體外部的冷漠與排斥。這又會催生新的族群對立與道德撕裂。如果把社會的道德淪喪歸咎為先天因素，誘發社會道德秩序的混亂，甚至給特定族群貼上“遺傳基因道德低下”的社會標籤。權力者以“為你好”為名，系統地消除被他們視為“不道德”的情感、傾向與生活方式，最終扼殺道德規範多樣性與社會創新的活力。

三、說好了，再做

當前，任何形式的道德基因增強人體試驗均不應該開展，倫理審查委員會也不應審批此類專案，因而它缺乏應有的科學價值和社會價值。為此，我們認為，Eberl 和 Ajibola 似乎默認了一種“先做了再說”的觀點，即：有條件允許道德基因增強，而通過差、知情同意、風險利益權衡、公眾監督等方式來妥善處理道德

基因增強引發的問題。這種論證思路是值得商榷的。如今，國際社會普遍禁止開展非醫學目的基因編輯人體試驗。本人於2014年出版的《基因治療之倫理審視》一書中，考察了非醫學目的基因增強引發的代理同意、代際公平、風險-受益比、開放性未來的權利等倫理議題。

哈佛大學桑德爾教授在《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指出：人類增強替代了對人的天賦的培養，從而損害了人類謙卑、責任及團結等倫理價值。對人的自然道德狀態的操縱，是人性欲望高漲或技術完美主義的表現。難道人類對高尚道德境界的追求能靠生物增強技術來解決嗎？這種技術決定論的論調顯然是虛無和錯誤的。桑德爾對人類增強的批判捍衛了人類天賦的保守主義立場。此外，雅克·埃呂爾在《技術社會》《技術系統》等著作中尖銳地指出：技術成為一種驅動社會變革的獨立力量，決定和支配著人的思維和社會狀況。在資本、權力的裹挾下，貿然開展的道德基因增強技術會沿著自身發展的邏輯“野蠻生長”（仲鳳行2024）。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仲鳳行、陳安天、張新慶：〈技術、資本和權力對臨床決策的影響機制探究〉，《醫學與哲學》，2024年，第40卷，第6期：頁7-10。Zhong, Fengxing, Antian Chen, and Xingqing Zhang. 2024. "Reflection on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Capital, and Power on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Medicine & Philosophy* 45(6): 7-10, 18. doi.org/10.12014/j.issn.1002-0772.2024.06.02
- 埃伯爾、阿吉博拉：〈我們能通過生物技術構建道德更為完善的人類嗎？〉，《中外醫學哲學》，2025年，第23卷，第2期：頁85-113。Eberl, Jason T. and Matilda Ajibola. 2025. "Can We Biotechnologically Construct a Morally Better Hu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85-113.
- Ledford, Heidi. 2020. "CRISPR Gene Editing in Human Embryos Wreaks Chromosomal Mayhem." *Nature* 583(7814): 17-18. doi.org/10.1038/d41586-020-01906-4
- Yang, Nan, et al. 2003. "ACTN3 Genotype Is Associated with Human Elite Athletic Perform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73(3):627-631. doi.org/10.1086/377590